

金融票号

史论



孔祥毅 著



中国金融出版社

金融票号史论

孔祥毅 著



中国金融出版社

责任编辑：毛春明 申雅娟

责任校对：李俊英

责任印制：裴 刚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金融票号史论/孔祥毅著. —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 3
ISBN 7-5049-3018-0

I. 金… II. 孔… III. 票号—经济史—山西省—文集
IV. F832.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13715 号

出版

发行

中国金融出版社

社址 北京广安门外小红庙南里 3 号

发行部:66024766 读者服务部:66070833 82672183

<http://www.chinafph.com>

邮编 100055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佳信达印刷有限公司

尺寸 169 毫米 × 239 毫米

印张 33

字数 660 千

版次 2003 年 4 月第 1 版

印次 200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60.00 元

如出现印装错误本社负责调换



孔祥毅,男,1941年生,中共党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部级优秀专家。山西财经大学教授,辽宁大学博士生导师,中国商业史学会会长,中国供销合作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国商业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中国金融学会常务理事,山西省商业联合会副会长,辽宁大学、山西大学、华北工学院、北京商业管理干部学院客座教授,山西省工程咨询专家委员会专家。

1963年8月毕业于山西财经学院财政金融系,毕业后留校任教至今,主要讲授货币银行学、中央银行学、金融史、宏观金融调控等课程。1986年评为副教授,1991年晋升教授。曾先后担任山西财经学院财政金融系金融教研室主任、系副主任、经济研究所所长兼科研处处长、《山西财经学院学报》主编,山西财经学院副院长、院长,兼学术委员会、学位委员会、教材编审委员会主任,1997年12月至2000年10月任山西财经大学党委书记。



孔祥毅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和成果

研究方向

金融理论和金融史

主要论著

著作,主要有:

- 《阎锡山和山西省银行》(总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0 年
- 《中央银行概论》(与慕福明合作)中国金融出版社 1986 年
- 《三晋经济论衡》(副主编)中国商业出版社 1993 年
- 《金融贸易史论》中国金融出版社 1998 年
- 《金融经济纵论》中国金融出版社 1998 年
- 《中央银行通论》(第二版)(主编)中国金融出版社 2002 年
- 《百年金融制度变迁与金融协调》(主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 年
- 《金融理论教程》(主编)中国金融出版社 2002 年

论文 100 余篇,主要有:

- 《山西票号与清政府的勾结》《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4 年第 3 期
- 《控制货币,搞活资金》《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1986 年第 4 期
- 《加快股票市场国际化规范化步伐的思考》《财贸经济》1995 年第 5 期
- 《农村信用合作社管理体制改革的探讨》《财金贸易》1991 年第 4 期
- 《也谈金融可持续发展》《金融时报》理论版 1998 年 7 月 2 日
- 《经济泡沫的金融根源》《金融时报》理论版 1999 年 9 月 11 日
- 《金融协调:一个新的理论视角》《金融时报》理论版 2001 年 2 月 10 日

获奖成果

- 参编《中国近代金融史》(中国金融出版社)1988 年被评为全国高校金融类优秀教材二等奖
- 《中央银行概论》(中国金融出版社)1990 年被评为山西省首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合作主编《中国社会主义金融理论》(中国金融出版社)1991年被评为全国高校金融类优秀教材二等奖

参编《中央银行学》(中国金融出版社)1991年被评为全国金融类优秀教材三等奖

《山西商人及其历史启示》(论文)1992年被评为全国报刊优秀理论文章一等奖,1994年被评为山西省社科优秀应用成果一等奖

《三晋经济论衡》(中国商业出版社)1995年被评为山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

《山西票号与清政府的勾结》1995年被评为山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
《金融贸易史论》(中国金融出版社)1999年获中国商业历史学会优秀成果一等奖



前言

不知不觉大学毕业已经四十年了。在这四十年中,除了最近搞了十几年学校管理工作外,基本上都是读书、教书、写书。搞学校管理也没有停止读书、教书、写书。我觉得不读书就教不了书,为了教好书,还得写书。我们这些搞社会科学的,不可能在实验室发现规律。研究经济金融理论,需要研究经济金融历史,通过经济金融发展过程的分析,去探讨规律性。

1963年一踏上工作岗位,领导交给我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参加山西票号史料编写组的工作。山西票号史料编写组是1960年成立的,是学校的一项重点科研课题。从1960年开始,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包括配有精通英文、日文,能够翻译历史资料的研究人员。到1963年春主要资料收集工作基本完成,书稿框架已经出来,大约在1963年9月系里调整了教学与科研人员的力量,减少编写组成员,我是编写组的新兵。编写组给我的任务是收集、研究票号为什么会发生在山西的史料。记得一位老师对我说,票号发生在山西而不在别的省,看来与山西商人有关,但是别的省区也有商人,为什么没有产生票号呢?我带着这个问题,在山西省图书馆泡了三个多月,翻阅了40多部府、州、县志,还有20世纪初中外学者们的一些研究成果,收获很大,心情也很激动。但是12月初的一天,学校突然通知我去省委党校学习一个月,然后下乡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这样我中断了这个题目的研究,也没有来得及写什么东西,下乡去了,一去就是三年,到“文化大革命”发展到红卫兵大串联时,才返回学校,但是票号研究已经停下来了。然而山西票号与山西商人的关系问题始终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

1974年12月,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接受了国家关于民国金融史的研究任务,派一位老同志来到人民银行山西省分行,要求山西分行配合研究民国时期阎锡山独立王国统治下的山西省银行历史。为了完成这个任务,人民银行山西省分行商得山西财经学院同意,我被借请参加了山西省金融史编写组的工作,与山西省分行的同志一起对散在民间的和山西省图书馆、档案馆、国家第二档案馆,以及南京、上海、山西各县的资料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和整理,到1977年基



本完成《阎锡山和山西省银行》史料,1980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就在1977年《阎锡山和山西省银行》接近结束时,人民银行总行又指示山西金融史编写组继续完成《山西票号史料》收集整理工作。这样,人民银行山西省分行与山西财经学院共同成立了《山西票号史料》编写组,在原来山西财经学院整理的山西票号史料基础上补充修订,我又二度参与了山西票号史料的研究工作。

1981年我偶然看到一条消息,日本东北大学教授寺田隆信先生出版了一本《山西商人研究》的书,我写了一封信,并附去了我们的《阎锡山和山西省银行》一书。没过多久我收到了寺田先生寄来的日文版《山西商人研究》。我读了他的《山西商人研究》感到很震惊,一个日本人竟然能对山西商人的了解比我们山西人还清楚,我深感不安,这是山西人的羞愧,是山西财经学院学者的耻辱。后来又了解到日本还有老一代的学者左伯富先生,新一代的学者滨下武志、松浦章先生等都是研究山西商人的专家。心里想,山西商人在山西,山西商人研究的专家岂能在日本?

在山西财经学院和人民银行山西省分行的领导下,经过行、校两家共同组成的编写组全体成员的一致努力,1981年末完成了《山西票号史料》的补充修订,于1982年春天召开了“票号讨论会”,来自北京、上海、成都等地的专家对山西票号研究发表了很好的意见,到1990年,《山西票号史料》终于由山西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了。大概是由于这些经历,所以在后来的教学中,尽管我主要是讲授货币银行学理论,但是对金融史始终有着浓厚的兴趣。1984年参加了人民银行总行教育司组织的统编教材《中国近代金融史》的编写,完成了中国金融史1865—1894年部分,1985年由中国金融出版社出版。1986年,山西大学教授江地先生编辑一本《近代的山西》,约我写山西商业资本与票号的文章,我写了《近代史上的山西商人与商业资本》一章。这就是我进入金融票号史研究的缘由。

几年来,陆续写了一些山西商人和票号的文章,受到了社会的欢迎。特别是1991年我和张正明教授合写的《山西商人及其历史启示》文章,受到了省委领导高度重视,我们所极力褒扬的晋商精神开始影响当代山西人,晋商与票号的概念在山西干部中广为传播。1992年,在著名剧作家华而实等同志的努力下,“晋商文化研究会”成立,我作为研究会的副会长之一也积极推动晋商与票号的研究与宣传。1995年,晋中地委和行署决定建设晋中晋商大院文化旅游走廊,确立旅游经济为支柱产业的经济发展战略,使晋商和票号研究与现代经济发展联系起来,票号研究从此走出了经院式闭门研究的藩篱,给晋商与票号研究注入了活力。

后来我发现,就票号论票号有很多问题就讲不清楚,就票号与晋商统起来也有很多问题讲不清楚,它涉及经济、哲学、历史、管理、文化、建筑等许多方面的问题,只有用“晋商学”的概念来概括。但是,山西票号的历史地位更重要的是中国金融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我也感到明清中国金融发展史与欧洲同期的金融发展



史是基本相似的。明清中国十大商帮在推动中国农业经济的商品化、货币化和国际化的过程中的作用不可忽视,从明清到民国时期是中国社会经济由农业经济时代向工业经济时代转变的过渡时期,这是一场商业革命和金融革命,如同欧洲在16世纪到18世纪中期的商业革命和金融革命一样,是农业社会发展的必然,是工业社会发展的准备。从16世纪到19世纪中期,中国的对外贸易不包括纳贡贸易在内,其总额就已经是长期的贸易出超,大量的白银从国外流入中国,重商主义的理论在中国变得很现实。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商业革命和金融革命实际已经成为世界商业革命和金融革命的一部分,山西票号融入到了世界经济金融活动之中。在中国金融学会、中国商业史学会和山西财经大学2002年7月在太原联合召开的“山西票号国际讨论会”上,我作了《山西票号与中国商业革命》的发言。我认为“欧洲中心论”未必能够成立,山西票号在世界金融发展史的地位是必须承认的。

山西票号国际讨论会前后,我的研究生们向我提出很多问题,票号与钱庄、银行有什么关系?票号为什么发生在山西?票号为什么垮台?票号有什么经验和教训?上个世纪之交正是外资金融业进入中国市场时期,也是山西票号衰败时期,现在又是一个世纪之交,外国金融业又在大举进入中国市场,研究历史上的山西票号对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金融发展战略有什么现实意义,等等。几位青年教师建议我把有关金融史和票号的文章整理出版,也是对研究生们提出的问题的一个回答,我想这样也好。但是,这些文章发表的时间前后跨了20余年,有些问题的议题在今天看来似乎并没有多大意思,有些文章的观点今天看来也许并不完全正确,再三考虑,觉得保留原来文章的面目倒能说明晋商和票号讨论的大体进程。因此,为了帮助读者了解当时的情况,按照文章写作时间先后顺序排列,在每篇文章前面加了一个简要的论点背景。当然我也要说明,这些文章的观点未必都是正确的,我希望得到朋友们的批评。

2002年10月25日



目 录

1979 年

- 阎锡山与山西省银行 1
- 阎锡山早期的银行资本——山西官钱局和晋胜银行 6

1980 年

- 蒋、阎、冯中原混战与晋省金融 15

1981 年

- 略谈抗战前阎锡山的农村金融政策 32
- 应县广济水利股份有限公司述略 43

1982 年

- 山西票号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其性质 45

1983 年

- 中央银行制度的演变 51
- 山西票号与清朝官吏的关系 65

1984 年

- 清代北方最大的通事行——大盛魁 69

1985 年

- 关于银行发展阶段划分的历史考察 76
- 外国银元流通和中国自铸银元 93
- 钱庄与外商银行和票号的关系 97

1986 年

- 山西商品经营资本研究 102
- 山西货币经营资本研究 131
- 山西钱庄在中国金融史上的地位不可忽视 154

1987 年

把钱币研究与社会经济史研究结合起来

——兼谈沙钱、农民、官府和行会…………… 158

1988 年

山西货币商人在对外经贸中的贡献…………… 163

1991 年

晋商今鉴…………… 171

山西商人及其历史启示…………… 185

1992 年

发展对俄贸易是重振山西商务的契机…………… 202

商可富民,商可强国…………… 206

18 世纪初至 20 世纪初内蒙古南部地区的民间行会…………… 216

1993 年

晋商行会:自治自束自卫的商人机构…………… 227

鸦片战争后的货币制度与货币流通…………… 236

历史上外国银行在中国的设立及其活动…………… 249

中国现代银行业的产生…………… 265

清末金融风潮…………… 274

阎锡山的金融货币思想与实践…………… 278

1994 年

山西票号与清政府的勾结…………… 288

1995 年

晋商兴衰与市场…………… 304

1996 年

晋商概观…………… 306

1997 年

中国特色的股份制:人力股加资本股…………… 310

**1998 年**

明清时期山西货币商人的金融创新·····	315
“亚洲金融危机”是不是“亚洲奇迹”的终结·····	321
政府主导下的金融先导型产业调整·····	325

1999 年

中国金融的百年回顾·····	335
新中国金融五十年·····	341

2000 年

1883 年金融危机中的票号与钱庄·····	346
再谈晋商学研究·····	361
货币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演进·····	364

2001 年

中国历史上的银行家·····	370
----------------	-----

2002 年

山西商人与教育·····	375
山西票号与中国商业革命·····	384
山西票号壬子九十年祭·····	398
山西货币商人的标期和标利·····	406
山西商人对中国商业革命的贡献·····	411
历史上山西金融的对外开放·····	420
金融发展史纲·····	428

附录

让劳者有其股——访山西财经学院院长孔祥毅·····	487
解读晋商——孔祥毅教授访谈录·····	490



1979年

阎锡山与山西省银行

论点背景

本文是1979年6月为《阎锡山与山西省银行》一书写的概述，该书于1980年1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该书的史料收集、整理和编辑工作是在人民银行总行金融史编写组具体指导下，由人民银行山西省分行在山西财经学院的支持下组织领导的金融史编写组完成的。我作为编写组成员，从1974年末到1979年参与了该书编写的全过程。在出版前为本书起草了内容概述。字数不多，基本反映了历史事实。但是限于当时的背景，文章中的用词，还流露着极左时代的某些痕迹。这里没有修改，保留了原貌。

民国时期的山西金融史，是很有特殊性的，当时在总行金融史编写组组织讨论时，大家都把它看作是一种特殊类型的金融史，称为“阎锡山独立王国统治下的金融”。其特殊性表现在自成体系：山西省银行在山西省有类似中央银行的职能，占据垄断地位，其金融体系号称“四行一库”，即山西省银行、晋绥地方铁路银号、绥西垦业银号、晋北盐业银号和山西省省铁垦盐四银行号实物十足准备库，实行货币的物产证券本位制度，与南京政府的法币建立汇兑联系，一直到抗战时期的1941年后才实行法币政策。

山西省银行（以下简称省银行），是山西土皇帝阎锡山的官僚资本金融机构，它随着阎锡山军阀政权的建立而产生，又随其军阀政权的崩溃而灭亡。在阎锡山统治山西38年的历史过程中，省银行自始至终都是个封建“独立王国”的“中央银行”，残酷地掠夺劳动人民的财富，成为阎锡山维持军阀割据的财政支柱。

1911年，阎锡山窃取了山西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后，面临着



严重的财政经济困难。最初，他采用“募捐”和向巨富“借款”的办法，解决了一些临时的困难。旋于1912年组设山西官钱局，但仍满足不了军政费用激增的需要。1918年，阎锡山兼任山西省省长后，又设立了铜元局，用低价收买民间制钱改铸铜元的办法，仅1年多就获利360万元。于是，受到“启发”，筹组山西省银行，于1919年8月1日正式开始营业。预定资总额为300万元（实收120万元），股本来源：一是接受官钱局的财产；二是用军政府“劝募”的借款转为省银行股金；三是省政府拨款。首任总经理阎维藩未及一年即去职，由阎锡山的叔丈人徐一清继任。

省银行成立后，在太原设总管理处。总管理处下设总稽核、总文书、总营业、总会计及司券、司库，时称“四总两司”。另设太原分行对外营业。在各主要县城及区设立分行、办事处和寄庄。随着阎锡山反动势力的扩张，又陆续在天津、上海、汉口、北京、石家庄、保定、绥远等地设立了分支机构。到1929年，省内外分支机构达40余处，形成了一个触角四伸的金融组织。

省银行的经营方针，按其章程规定，“以调剂金融，扶助生产事业的发展”为宗旨。经营的业务范围主要有八项：存款；放款；汇兑；买卖生金、银；折收未满期限票及汇票；代表有交往之银行、公司、商号及个人收取各种票据和款项；代人保管贵重物品；办理储蓄。但是，章程上的规定只是个形式，实际搞什么，则完全根据阎锡山统治集团的需要而定。例如，章程上的规定并无发行纸币、经营产业这两项，然而省银行一成立，就迫不及待地印发钞票（人们习惯上称之为“晋钞”），并经营地产、投资工业，攫取巨额利润。

省银行为了垄断纸币发行权，以“划一币制”为名，凭借政府的法令，取缔了私营商号的钱帖子，而省银行的纸币并无保证准备。开始一段时期晋钞可以十足兑现，当群众被迷惑后，即大量发行纸币。据统计，截至1928年底，十年间共发行纸币1300万元，平均每年130万元。从1929年起，为了支持更大规模的“倒蒋”战争，更肆意滥印滥发。当时，阎锡山、冯玉祥、汪精卫的70万军队的饷项，全赖山西省银行的印钞机，晋钞随之涌向省外，到1930年10月底，纸币发行量猛增至近1亿元。不久，“倒蒋”战争失败，晋钞随同军队一起，像飞蝗一样涌回山西，市场商品被抢购一空，通货急剧膨胀，金融极度混乱，给山西人民带来了严重的灾难。

1930年底，阎锡山挟历年掠夺山西人民所得的巨款逃往大连，托庇于日本帝国主义。接着，商震出任山西省政府主席，想了种种办法，力图维持省银行的局面，但都无济于事。省银行仍处于严重的危机之中。



二

1932年初，阎锡山与蒋介石达成妥协，重掌了山西的军政大权。他一上台，就利用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现状的强烈愿望，高喊“造产救国”的口号，立即着手整顿、改造省银行。他首先借口总经理高步青有以落价省钞套取省银行库存现洋的不法行为，勒令高退出现洋100万，并撤销高步青总经理职务，另委王襄为总经理。接着发行“兑现券”，以新钞1元收兑旧钞20元。其次，修订省银行章程，定为“官营民监”，标榜什么“以后概不借垫军、政各费”等等，并由省政府特派监理员1人，监理一切收支及各项财产。第三，裁撤机构，削减职员。第四，规定省拨银行资本为1200万元，由省政府分年拨给，以后增至2000万元。第五，由省政府授予发行纸币、经理省金库和省建设金库以及募集和经理公债等特权。

这次省银行的所谓“改组”，实际上并没有给省银行增添多少信誉。于是，从1933年开始，先后成立了晋绥地方铁路银号、绥西垦业银号和晋北盐业银号3个官僚资本金融机构，初步预定3家资本合计550万元。1936年，以一纸空文分别确定资本为1000万元、200万元、100万元。这3家官银号，名义是“以发展晋、绥两省地方所有铁路和扶助有关铁路建设事业”，“扶助垦牧事业”，“扶助盐业经济，调剂盐区各县金融”为宗旨，实质上是与省银行四位一体，相互配合，通过发行纸币，办理存放汇兑等业务活动，进一步垄断全省金融，控制经济命脉。

为了把银行资本触角伸向农村，瓜分农村高利贷资本的利润，进而独占农村金融市场，省银行又积极支持筹组县银号和村信用合作社。通过对县银号“息借”资本，村信用合作社向县银号“息借”资本以及县银号、村信用合作社、当铺“代发”省银行兑换券等种种办法，尽收农村金融机构为其附庸，层层借贷取利，成为农村高利贷资本的总后台。

1935年，蒋介石政府实行“法币”政策后，阎锡山进一步加紧宣传他的所谓“物产证券”理论，成立“山西省省铁垦盐四银行号实物十足准备库”。以“实物准备”为幌子，用四银行、号（省银行、铁路银号、垦业银号、盐业银号）的纸币，强行收购人民的产品，高价出售，赚取商业利润，美其名曰“收物发券，售物兑现”，肆意进行投机活动。

随着银行资本的膨胀，阎锡山又进而扩展其官僚资本工商业。他以省政府和太原经济建设委员会的名义，大量发行名目繁多的所谓“借款券”，如“统一建设借款券”、“公路建设库券”等，实际上就是地方公债。以省银行为首的四银行、号，是借款券的主要承购者，它们以借券为“准备”，满足供应官僚资本工



业商业的需要，只要阎锡山画个“可”字，要多少钱给多少钱，而且美其名为“核准发行”。截至1937年8月底，仅山西省银行承购这种“借款券”未还本者，尚有4 927万元，超过其资本总额1倍多。

阎锡山为了便于控制，把银行资本与工商业资本结合起来，统一管理。于是又有康采恩式的所谓“山西人民公营事业董事会”这样一个包罗万象的组织，来经管阎锡山官僚资本的主要工业、交通运输业、商业和金融业。它不仅有人事管理和任免权，而且有资金调度与运用权。它的最高权力机关是“督理委员会”。阎锡山亲任首席督理委员，至高无上，大权独揽，成为实际垄断山西经济命脉的太上皇。他直接指挥垄断资本进行的各种活动，排挤、吞并民族工商业，聚敛财富。

三

“七·七”事变后，日寇大举进犯山西，阎锡山匆忙令四银行、号合并为二银行、号（垦号并入省行，盐号并入铁号），随军逃窜。由省银行和铁路银号抽调员12人，组成“随营银行办事处”，沿途给军政人员发饷，其余人员押送资财撤往西安。

阎锡山带领其军政机关撤至晋西后，一面令省银行抽调大批人员携带巨款赴成都筹组“华利号”，令铁路银号筹组“裕中商行”，进行商业投机；一面又在晋西成立5个银行办事处，并在陕西秋林“票济村”开动印钞机，大量发行“花脸票”（因纸质不佳，票版粗劣，币面模糊，人们称为“花脸票”）。从1939年开始发行，到1941年停印，不到三年时间，共印发1.3亿元，区区晋西只有5县（后来才有5个完整县、7个不完整县，共12“县”），晋钞如此大量发行，形同废纸，人民怨声载道，拒绝使用。阎锡山为了平息民怨，竟以高价出售大烟土和实行田赋附加办法，来抑制晋钞的贬值趋势。同时，为了从蒋介石政府那里发一笔财，1940年，他回应财政部提出了“整理晋钞”问题，要求蒋“中央”给予支持。此项“交涉”延续两年之久，终因蒋介石、孔祥熙不买这个账，阎锡山碰了一鼻子灰，“整理晋钞”不了了之。

开设在四川成都的省银行、铁路银号的这种“华利号”、“裕中商行”，在汉中、广元、兰州、成都、重庆以至昆明等地，大量倒贩、囤积金银、纱布以及其他日用品，大发国难财。仅1940年，即盈利87万元，超过资本总额近两倍。由于投机生意越搞越凶，与地方利益发生了冲突，1943年被四川当局驱逐出境。

在此同时，阎又提出了所谓“新经济政策”，成立了名目繁多的所谓“合作社”。名曰“合作”，实为官办，严禁私人经营工业、手工业和商业，强制推行一个地区、一个商店、一个价格的政策，垄断市场，从而控制了人民的生产、交



换和消费。为了解决这些“合作社”的资金问题，又大量发行“合作券”，用“没收货物给收条”的办法，掠夺人民的资财。因此，晋西人民把这种“合作券”讽之为“活捉券”。

四

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经过八年浴血奋战，打败了日本侵略者。阎锡山为窃取抗战胜利果实，暗中与日寇山西派遣军秘密勾结，利用日伪力量，抢先进占了太原。山西省银行也跟着阎锡山的军队返回太原，开张营业。

省银行恢复营业后，第一件事就是伙同德国纳粹分子扬宁史等人，合组“同记公司”，大搞买办投机，为阎锡山进行反共反人民的罪恶勾当提拱大量外汇资金。同时，更肆无忌惮地大搞囤积物资、倒卖金银等投机倒把活动，牟取暴利，并通过祝寿献调等方式为阎死守太原“堡垒城”积极筹措资金和物资。在此期间，为了应付伪“中央”的命令，省银行被迫进行了所谓“改组”，表面上由“民营事业董事会”（公营事业董事会在抗战胜利后改称民营事业董事会）改归省政府领导，实际上仍是阎锡山统治集团的摇钱树。在阎锡山政权行将灭亡的前夕，省银行又积极替其转移资产，犯下了严重的罪行。

1949年4月2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克太原城，彻底捣毁了土皇帝阎锡山盘踞了38年的老巢。中国人民解放军太原市军事管制委员会金融接管组迅即进驻山西省银行，胜利地完成了接管工作。至此，山西省银行终于回到人民手中。